

艰难抉择

1976—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

薛庆超◎著



台海出版社

艰难抉择

1976—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

薛庆超◎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抉择:1976~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 / 薛庆超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2

ISBN 978-7-80141-745-9

I. ①艰...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现代史-1976~1978

IV. ①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456 号

艰难抉择:1976~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

著 者:薛庆超

责任编辑:谢 香 刘新玲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通联图文

责任校对:韩 海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63.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60×1040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6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次: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745-9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多事之秋

第一章 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1
第二章 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3
第三章 朱德委员长逝世	16
第四章 毛泽东主席逝世	21

第二部分 批邓风潮

第一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浊浪滚滚	28
第二章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34

第三部分 毛主席手书

第一章 毛主席手书：“照过去方针办”	45
第二章 “按既定方针办”的出现	47

第四部分 粉碎四人帮

第一章 中央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50
第二章 中央领导层形成一致意见	60
第三章 彻底粉碎江青集团	70
第四章 国际舆论关注粉碎“四人帮”	84
第五章 上海叛乱一触即发	89
第六章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97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02

第五部分 邓小平恢复工作

第一章 历史发展要求“小平出山”	109
第二章 恢复邓小平职务	114
第三章 高屋建瓴应对国内外重大问题	120

第六部分 中共召开十一大

第一章 中共十一大强调“抓纲治国”	129
第二章 叶剑英当选委员长	133
第三章 邓小平当选政协主席	141

第七部分 拨乱反正

第一章 恢复高考	144
第二章 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	154
第三章 “教育黑线”专政论的由来	162
第四章 教育系统拨乱反正	167
第五章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75

第八部分 中央工作会议

第一章 扭转乾坤的中央工作会议	184
第二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197
第三章 康生问题被揭露	206

第九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

第一章 拨乱反正的先锋胡耀邦	214
第二章 凝聚人心的重大举措	221
第三章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40
第四章 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249
第五章 为彭德怀元帅平反	260
第六章 为陶铸平反	268

第七章	习仲勋受命主持广东工作	282
第八章	坚冰开始逐步融化	290
 第十部分 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章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306
第二章	解放思想与“历史反思”	316
第三章	《伤痕》应运而生	324
第四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334
 第十一部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转折	343
第二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丰富内涵	350
第三章	实现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	358
第四章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形成	369
 第十二部分 国际关系的新发展		
第一章	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379
第二章	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388
第三章	改革开放的世界战略	398
后 记		407

第一部分 多事之秋

第一章 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1966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六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战胜了外来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

劳动者。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农村几乎没有的农业机械、化肥、电力、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都大大增加,全国粮食、棉花大幅增长,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核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一些运动项目取得出色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壮大,由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全军的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在国际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中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一切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然而,1966年5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使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陷入了“十年内乱”之中。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

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1975年周恩来病重，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首先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防修反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整合在一起，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对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混乱不堪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接着，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成效显著，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对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全党全军全国极为拥护。江青集团却处心积虑地加以反对。

1975年秋天，毛泽东因为重病在身，行动不便，将毛远新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身份特殊，相继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主要领导职务，是“文化大革命”的受

益者,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而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否定。因此,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非常不满。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就此,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同时,毛泽东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发出的一系列文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感到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截然对立的。

从此,毛泽东由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转而对邓小平持批评态度。

在此期间,发生了“刘冰上书”事情。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几位党委成员,对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破坏党委集体领导,破坏党的政策,专横跋扈,生活特殊化,极为不满。为此,刘冰等人先后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把邓小平说成是刘冰等人的“后台”。

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北京市委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继之,“四人帮”在清华大学掀起了一场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诬陷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的信是“诬告信”,“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

“四人帮”还硬说刘冰等人的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是“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是与“今年七、八、九三个月”刮的“一股右倾翻案风”互相密切配合的。就这样,“四人帮”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首先从清华大学打开缺口,进而蔓延到全国。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

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强调：“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刚刚在“全面整顿”中趋于安定的中国，又出现新一轮的“天下大乱”。

此时，周恩来的生命逐渐进入了尽头。一方面他以超过常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一方面又敏锐地注视着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邓小平经常到医院看望，询问病情，谈论工作。每当周恩来病情不好时，邓小平总是很快赶到医院。在周恩来住院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一共到医院看望63次。

1975年12月20日清晨7时，周恩来要找中共中央调查部^①部长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医务人员用电话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心情沉重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子，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2日下午1时半，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周恩来医疗组的紧急汇报。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和其他五位中央负责人赶到三〇五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床边，直到看见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回转后，才离开医院。

对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周恩来极为关注、大力支持，并对邓小平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胆识、魄力、才干给予充分的肯定。1975年12月，周恩来已经濒临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20世纪伟人，仍然一如既往，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心着正在遭受错误批判的邓小平的前途和命运。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

^① 中共中央调查部建立于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改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纲,其余都是目。

“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1976年1月7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肆无忌惮地诬蔑邓小平在全国搞右倾翻案、复辟倒退。同时,“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大量印制的《邓小平右倾翻案言论集》,散发到全国各地。但是,与“四人帮”的愿望相反,上述材料在全国传播开来以后,反而使拥护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更加支持和崇敬邓小平了。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词:

其中一首是1965年5月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曰: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1965年秋天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词曰: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后,便多次让工作人员朗读,悉心琢磨发表毛泽东这两首词所表达的政治内涵。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来,40多年间,周恩来忠心耿耿,甘为辅弼,与毛泽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使得海内一统,举世赞佩。“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直面内乱,力挽狂澜,保证了中央党政军领导核心和中枢工作的正常运转。1974年12月,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飞往长沙,与在长沙的毛泽东彻夜长谈,共商国是,议定了由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计。如今,毛泽东与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久卧病榻,难以相见。

毛泽东最后一位机要秘书回忆说：“他们的病榻相距并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三〇五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次日11时05分，邓小平带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走进周恩来的病房，面对周恩来的遗体肃立致哀。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恩来同志，安息吧！”最后，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周恩来遗体三鞠躬，目视周恩来的遗容，缓缓退出病房。

周恩来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发出讣告，极其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逝世，使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中断了。这时，邓小平在名义上还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他忍受着心中巨大的悲痛，周密地安排周恩来的丧事。

周恩来逝世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

毛泽东批示：“同意”。

1月9日，邓小平再次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谢胡（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引者注）和阿利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引者注），明晨动身；日本的三木武夫（日本首相——引者注）和阿利雅，明晨动身；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斯里兰卡总理——引者注），今晚动身。”

邓小平还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邓小平并且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乔冠华约

见日本驻华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驻华大使。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1月9日，中央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当日寒风凛冽，首都的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

1月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多人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德高望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步履沉重地走到老战友身边，郑重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致以最后的敬礼。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等向周恩来沉痛志哀，作最后的诀别。在北京医院门前，大批自发赶来的人民群众不断地用手擦拭着眼泪，希望能够最后一次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敬意和哀思。

但是，“四人帮”却无视民心，不顾民意，倒行逆施。当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有关事宜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意见竟下达禁令，不许组织悼念活动的报道。在“四人帮”控制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闻媒体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有关方面甚至下令，不准挂周恩来遗像，不准个人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不准人们戴黑纱。更有甚者，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竟然强迫中央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部追查人民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

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无限的悲痛。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志哀时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广大民众在电视中看到江青对周恩来的不敬和造作丑态后，极为愤怒。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中国人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拥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泪洒衣襟。此情此景，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此期间，联合国秘书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著名政治活动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纷纷致电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周恩来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当时，大文豪郭沫若曾写出《怀念周总理》一诗，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逝

世后,万民垂泪,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荫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为举行周恩来追悼会,邓小平于1月12日致函请示毛泽东:“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画圈并批示“同意”。这样,周恩来追悼会就确定下来了,悼词也确定下来了。

但是,由谁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又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在中央开会讨论追悼大会议程时,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说:我不能作,悼词由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江青、张春桥反问道:那合适吗?叶剑英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叶剑英的话,义正词严,非常坚决。得到与会多数同志支持。“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周恩来追悼大会的议程确定后,邓小平即于1月14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水流,他们商定改用安—2型飞机撒到江河大地,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比撒在固定一地好,应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十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画圈表示同意。至此,周恩来丧事活动安排的大事基本确定下来。

若干年后,当年参与起草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和追悼大会《悼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发表回忆文章,披露了围绕这两篇文稿审定过程中的有关情况。

1975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只有很少人参加的小范围会议。透露说,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周恩来总理医疗组的汇报。经过几次大的手术,目前周总理的身体非常虚弱,已经不能下床,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根据周总理目前病情的

发展趋势，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先在很小的知密范围内，指定少数同志对周总理的后事预做准备。要准备的主要有：一、起草讣告和悼词，这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一旦出现不幸事件，到时候临时撰写就要误事。二、拟定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讣告和悼词由周启才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拟出初步方案。完成时间暂定10天。

周启才回忆说：

总理住进305医院后，病情严格保密。这次听了汪东兴、纪登奎的讲话，我才知道总理病得如此严重。这使我忧心忡忡，哀伤不已。根据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性质和我担负的工作任务，我只能安排每天凌晨一点至四点来完成中央交办的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完成了讣告和悼词起草工作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他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上午10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了我，要我携带讣告和悼词初稿，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同李鑫同志一起进行修改。李鑫对个别语句做了一点修改和补充，对基本内容、段落结构表示赞同。

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周总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主席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进行广播。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1月12日下午3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开始，邓小平就先声夺人，他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以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问题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主张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

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

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滋生是非,遭到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抑制。

会后,周启才等同志认为,周恩来总理一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考虑再三,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们驱车赶到邓小平家中,汇报了这个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毛泽东主席于1月14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①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邓小平高度评价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南昌起义、长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指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等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转折关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

邓小平高度评价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指出: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

^① 周启才:《周恩来讣告和悼词形成前后》,载《世纪》杂志2003年第11期。